

第一章 司马攻文学创作的概况

马君楚，笔名司马攻、剑曹、田茵、陈齐等，于 1933 年出生于暹罗，祖籍湖南区成田乡，少年时曾回家乡读书，17 岁重返暹罗谋生。由于从小便接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且聪颖好学，就此打下了良好基础。先生于六、七十年代经常遨游西欧各国及国内各府，从而拓展了心灵视野，宽阔了创作源泉，他的作品题材丰富，内容广泛。与此同时，司马攻先生所从事的各项商务企业，由于经营得当，管理有方，亦获得相当成就，从而成为泰华文学艺术界中，亦文亦商学者事业家的成功典范。难得的是先生无论商务怎样繁忙，始终没有舍弃那支神来之笔，以高雅流畅的笔调，写下许多清新洒脱的散文、充满情趣的游记、和犀利幽默的杂文以及深富人情味的中短篇小说，他以一颗灼热的心，一份诚挚的情，在这片文学园地努力耕耘。

第一节 司马攻的文学创作

司马攻的文学成就斐然，他从上世纪 60 年代涉足文学创作以来，硕果累累，先后出版了散文集《明月水中来》、《司马攻散文选》；杂文集《冷热集》、《挽节集》、《蹄影集》、《泰国琐谈》、《湄江消夏录》；随笔集《梦余暇笔》、《人妖·古船》；微型小说集《独醒》、《演员》；诗集《挥手》；文学评论集《泰华文学琐谈》、《司马攻序跋集》以及《司马攻文集》等；他还主编《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泰国卷》10 卷文集（1998 年）和《泰华作协千禧年文丛》32 册（2000 年）。1985 年，他被聘为“泰华写作人协会”顾问，后被选为第 4 届副会长。1990 年，“泰华写作人协会”更名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司马攻被选为会长至今，为泰华文学创作的繁荣和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

司马攻的写作生涯开始于 60 年代末 70 年代初，1970 年以后，他虽然也断断续续为香港、台湾及泰国一些报刊写过文章，但那时他对写作没有太大的兴趣，1971 年到 1972 年之间，他应《东南日报》主任魏登（笔名史青）和总编辑吴继岳之约为其写专题，一年之间写了各种各样的文章八九十篇，差不多 50 万字。

这一段时期的作品都被他收入《泰国琐谈》一书中，后来他自己称这些作品为“四不像”。这些作品在艺术水平上不高，但是有作家自己的感受和发现，显示了司马攻观察事物的敏感细腻和良好的文字功夫。之后，他停笔了十二年，直到1986年，他才又拿起笔，1988年，他和梦莉等联手出版了《轻风吹在湄江上》，半年后有和其他作家合作出版《尽在不言中》，同年出版了他的杂文集《冷热集》，受到读者与批评界的好评。自此之后，他的创作丰富起来，短短的几年中，出版了散文、杂文、特写、随笔、微型小说、散文诗及文艺评论集等各种文体的作品十几本专著，他的作品数量多质量高，是泰华作家中领军人物。

他的散文有自己特色。第一，表现在题材上，“怀忆故乡”之作占了他整个散文创作的一半以上。他虽然出生于海外，但是整个童年在潮汕的平原上度过，潮汕特有的文化在他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终身难以忘怀。另外，他在泰国的有一段时间，华文被排斥和冷落，虽然这令人不快的一页已经过去，但历史留下的阴影没有马上消失，他的思乡怀旧在寂寞痛苦中，有一种弘扬中国传统文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先生出任泰华作家协会会长以来，曾多次率团赴中国及新、马、港各地，出席有关华文写作交流研究会，希望让更多的读者能了解泰华文学先生更在泰国主持召开世界华文微型小说研讨会，邀请世界各国与地区逾五十位作家学者来泰共同商讨当前各国及地区华文文学的趋势与流向，增强彼此间对华文艺术的交流联系，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司马攻的散文以抒情见长，注重发掘寻常景物中不寻常的内在美，以情动人。他的散文集《人妖·古船》、《明月水中来》中的作品受到佛教影响非常明显，他的散文作品中许多道德及小乘佛教教义的插入。

佛教在泰国的传播有着悠久的历史，并且成为泰国的国教。早期，印度婆罗门教就已经在现在泰国地区的一些独立小国传播。13世纪，小乘佛教从印度传入泰国，之后与泰国当地已流传并流行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和祖先鬼神崇拜等原始宗教信仰相结合，形成了既有当地流传宗教教义又具有泰国特点的小乘佛教。在泰国宪法中，规定国王必须是虔诚的佛教徒或佛教赞助者，在泰国，直到现在僧侣还有很高的地位。古今泰国皇室，政府和民间的很多仪式都采用印度教和佛教礼仪，如国家庆典、皇家礼仪、阅兵仪式、民间仪式、商店开张、结婚祝寿等

都必须有僧侣到场诵经祝福，丧葬祭祀也由僧侣祈祷超度，由此可见，佛教在泰国有着很大的影响。

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发展，佛教思想已完全进入了知识分子和上层文人的思想深处，佛教义理及佛教学说在泰国的广泛传播，影响了文人的心态和审美观。因此我们有必要探讨佛教与散文之间的关系，这样更能有助于全面深刻的认识和评价司马攻的散文。

第二节 司马攻散文的创作背景

泰华文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处于沉寂的状态，八十年代之后终于走出了低谷，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而在这一派喜人的景象中，散文更是以自身的魅力散发出迷人的芳香，甚至有压倒群芳的态势。可以这样说，八十年代泰华文学的繁荣，主要是散文创作的繁荣。

泰华散文在八十年代的繁荣，有着时代的影响、社会的因素、文化的背景和作家主观的努力。从客观环境来说，主要是由于七十年代中后期，中泰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由于时局变的明朗，中泰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好，于是散文的创作也随着时局的变化而出现了“治世之音安以乐”的转机。这时期，各种华文报刊如《新中原报》、《中华日报》、《泰商日报》等等纷纷创刊，出版华文作品，举办“散文征文比赛”等活动，这些无疑为泰华散文的勃兴提供了必要的阵地和契机。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泰华作家中，百分之八十是广东潮汕的老作家，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深深的认同感，里面有一种无法斩断的寻根意识。这正如司马攻先生在《泰华散文集》中说：“很多人说，用华文在海外从事写作，这恐怕是最末一代了！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用华文来写作的作家，也都是末代的作者了！末代这个词是可悲的，用华文来从事写作的人都不想当末代作者，我们不想要这个头衔，更不想华文在海外真的有末代。”又说：“我们希望这些集子的出版，就好似在下坡路上筑了一个站，使泰华文学的滑落能够停一停，看看有没有峰回路转的机会，更希望由这套丛书的出版，对泰华作者有所鼓励，对外则起着桥梁的作用，使其他地区的读者对泰华文坛有更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同时对目前寂静的泰华文坛有所刺激，而对未来泰华文学史

有参考的价值。”这是一番发自内心肺腑的话，他们处在一个开放文明的年代，但是他们又别无选择的生活在一个华文日趋衰微的社会环境里，这样虽然他们的脸上还有笑容，但是心里却有很多的苦涩。真是面对着年轻的一代与华文日趋断层的严酷现实，他们这些中老年作家感到了一种责任感和紧迫感，使他们感到有责任通过散文这一文学形式来延续中华文学在海外的传承，并使之在年轻的一代心中扎根。基于这些原因，尽管有的作家已经功成名就，过着安逸的生活，有的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仍然拿起笔，呕心沥血，锲而不舍的写出一篇篇散文。这确实是一种不屈的精神，令人深感敬佩。

除了客观原因和作家主管的努力，散文这一文体自身的优势也是它在八十年代兴起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大家知道，散文的特点是自由自在，可长可短，即可叙述，也可议论，即可写实又可抒情。它的这一特点正好适合泰华这样的商业社会里作家的写作习惯和读者的欣赏要求。泰华作家大都亦尚亦文，文学时他们经商之余的创作，他们的时间一般比较零碎而有限，这样一来，他们自然比较倾向于那种短小精悍的文学形式来记载下他们工作之余的所思所想，或抒发他们的人生的感怀。从读者的角度来看，现在的生活和工作节奏的加快，以及各种传媒的竞争，他们往往没有耐心去读长篇巨制，散文的短小精悍却符合他们的阅读心理，正是这两方面的结合，散文在八十年代的泰华文坛上大放光芒。

上面几个方面的原因，是散文复兴的重要原因，据不完全统计，在八十年代出版的散文集达到 20 多本，其数量超过了同期出版的诗歌集、小说集。主要的作品集有：梦莉的《烟湖更添一段愁》；司马攻的《明月水中来》、《湄江消夏录》、《泰国琐谈》、《梦余暇笔》；姚宗伟的《瓦罐里开的花》、《东游随笔》、《欧游见闻录》；陈博文的《雨声絮语》、年腊梅的《常春藤》、《泰华写作人剪影》；史青的《北游麟爪》。在不长的时间里，出版了这么多的散文集，而且有的在国内外产生广泛的影响。

八十年代文坛上出现了一批优秀的作家，司马攻就是其中最杰出的作家。他和梦莉被称为“文坛双英”。司马攻对他所处的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但是也不深恶痛绝，所以他时不时对这个现存的社会考察和描述，更对其嬉笑怒骂。他的作品中，故乡题材充满了温情和陶醉，以泰国为背景的题材则讽刺和温和的气氛并存。他的作品深刻、含蓄和简洁，他喜欢表现人生大树上的根部，不是它的枝叶和繁花，总的来说，司马攻是一个现实主义者。

司马攻出生在泰国，祖籍是中国广东省潮阳市，他本名马君楚，写作时常常用司马攻的笔名，所以现在这个笔名被大家熟知。他一生阅历丰富、文学天赋极高，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他为人温文尔雅、谦逊平和，但是平和之中不乏幽默和俏皮。他把文学家的纯真和梦想与生意人的务实和精明结合起来，形成了他作品理智、敏感和犀利的风格。

司马攻在泰华文坛上的地位，主要是他散文的成就。《明月水中来》、《人妖·古船》以及合集《轻风吹在湄江上》、《尽在不言中》、《泰华散文选》是他的代表作。

